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V
一、绪论 1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
1.选题背景 1
2.研究意义 2
（二）文献综述 2
1.国内研究现状 2
2.国外研究现状 5
3.国内外研究述评 7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9
1.研究思路 9
2.研究方法 9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9
1.创新点 9
2.不足 10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11
（一）核心概念 11
1.公共服务 11
2.公共法律服务供给 12
（二）理论基础 13
1.合作供给理论 13
2.新公共治理理论 15
三、L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现状 17
（一）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趋向多元 17
1.供给主体有所延伸 17
2.供给主体合作机构多元化 18
（二）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不断丰富 18
1.法律援助惠及民生 18
2.“三大”调解持续发力 19

3.普法宣传多措并举 20
4.安置帮教初显成果 21
（三）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成效有所提升 22
1.供给能力有所提高 22
2.便民程度有所提升 22
3.法治氛围日趋浓厚 23
四、L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4
（一）存在问题 24
1.供给主体合作不充分 24
2.供给内容较为传统 26
3.供给方式较为单一 28
4.供给资金投入不足 30
（二）原因分析 32
1.供给主体合作机制不完善 32
2.供给内容缺乏需求导向 32
3.供给方式智慧化建设不足 33
4.供给专项经费保障缺位 34
五、L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优化对策 35
（一）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合作机制建设 35
1.探索建立供给主体合作机制 35
2.强化供给主体间沟通协调机制 36
3.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供给机制 37
（二）以需求为导向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 37
1.做好基层群众需求常规性调研 38
2.畅通基层群众反馈渠道 38
3.规范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39
（三）拓展公共法律服务智慧化供给建设 39
1.制定基层供给智慧化发展计划 39
2.有效利用基层智慧化设备 40
3.强化信息科技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40
（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面上政策支持力度 41
1.建立健全全区性考核责任制 41
2.适当进行财政政策倾斜 41
3.拓展吸收社会资金 42

结语 43
参考文献 44
附录 A L 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相关访谈提纲 47
附录 B L 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相关调查问卷 48
致　谢 52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53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诚信承诺书 54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55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55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一环，对于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我国在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方案，逐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如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保证人民群众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①]

在上级政策指导下，各地开始部署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完成基层法律援助站建设、落实法律顾问工作机制、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等。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决策倾向性不同、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力度不足等多方面原因，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水平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水平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推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均衡发展，为基层群众谋求更优质、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提高基层群众在公共法律服务上的获得感，极有必要加强关于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优化的研究。

L区为浙江省某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大，社会经济发展在省内也较为靠前。在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14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来，L区逐步建立了一定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基础。本研究以L区为例，基于当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现状，探究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产生的问题及存在的原因，并尝试提出供给优化建议，以期为优化当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提供一定的路径参考，对维护当地基层群众基本权益、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①]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http://www.gov.cn/zhengce/2020-12/07/content_5567791.htm.

2．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人民群众尊法守法意识普遍增强，公共法律服务也日渐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项目，而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水平是衡量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准的重要参考。本文以L区为例，研究探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优化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以L区为例，探究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优化路径，并尝试提出建立多元供给主体合作机制的可行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公共法律服务的地方性研究案例，且有助于拓展合作供给理论和新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维度。

（2）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基层群众基本权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基层群众法治意识逐渐增强，对于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日益强烈。优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有助于为L区基层群众提供更符合需求的、优质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从而在法律层面更好的保障群众基本权益，在基层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第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水平。基层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和相应职能。研究如何优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有助于推动L区基层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有效施力，使供给活动更加契合基层群众需求，提高群众满意度，从而有效提高供给水平，也为基层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助力。

（二）文献综述

1．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有关公共法律服务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针对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研究成果则比

较少。通过在知网上检索相关文献可知，涉及法律服务供给的既有研究中，期刊文章50余篇，学位论文20余篇，纸媒报道10余篇。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相关研究大致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相关研究

国内较多学者关注到了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有关问题，其中大多以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供给主体多元化方向的建议。

在关于政府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应该由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主要力量。刘旭涛认为，政府要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发挥其管理和监督职能，保障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产品。[①]陈荣卓、唐鸣在研究农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中提出，政府应该在解决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承担相应的农村基本法律服务。[②]曹吉锋提出，公共法律服务应由政府主导提供，全体群众一起参与其中，能够保障所有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③]安宁和潘越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既要提供充分的公共法律服务，同时这种提供行为本身也要经得起法治标准的检验。[④]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政府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还存在不足。如陈悦琳提出，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存在工作人员专业性程度欠缺的情况，体现在专职人员没有按照要求配备到位，志愿者机制尚未健全等方面，尤其是农村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匮乏的问题比较显著。[⑤]

在关于供给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提出了多主体提供法律公共服务的建议。徐尚昆提出，政府和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要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目标，通过彼此取长补短、分工合作，突出各自的优势，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同时要探索内部约束和外部激励的长效机制来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他认为公共法律服务涉及到了多个主体，包括政府在内还有民间组织、专业机构、社会大众等其他多样化的组织，需要关注政府和社会边界的界定，这将影响到这项制度

[①] 刘旭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56-64.
[②] 陈荣卓,唐鸣.农村基本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30(01):106-107.
[③] 曹吉锋.公共法律服务内涵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3):8-11.
[④] 安宁,潘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现代化治理路径[J].河北法学,2023(3):154.
[⑤] 陈悦琳.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机制研究[D].江苏大学,2020:32-33.

推进的成败得失。[①]张世红提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需要建立多层次、多梯度供给，统筹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公证员、社会资源等法律服务资源，在进行充分整合后参与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②]李晓昀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供给缺陷的现实选择，在公众的法律服务需求走向多元的现实背景下，政府难以逐一了解社会偏好，因此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是应对政府供给缺陷的行动选择。[③]

（2）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相关研究

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的研究大多以基层司法行政系统工作内容为主，普遍基于当地实际工作情况，主要包括基层有关部门向群众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并对其进行了具体论述和数据调查。

蒋银华认为，应当增加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行政赔偿等行政救济措施纳入需要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内容中。[④]刘炳君提出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一般性法律服务。[⑤]于泓源梳理出法律咨询、法律宣传、诉讼代理、刑事辩护、非诉讼法律事务、法律问题的咨询与帮助、民间纠纷矛盾的调处与化解以及代写法律文书和司法救助等服务内容，认为这些都属于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内容，其中还涉及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和司法救助等工作门类。[⑥]刘益良、朱赛金和高敏提出，通过政府部门主导，在保障公共财产投入的前提下，为全体群众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内容包含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开展法治教育以及纠纷调解等产品及服务，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满足公民的基本法律服务需求，这项活动涵盖了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服务内容和服务机制。[⑦]

---

① 徐尚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探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5):42-47.
② 张世红.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创新机制构想[J].人民论坛,2016(05):153-155.
③ 李晓昀.广西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双重逻辑与实践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1(11):64.
④ 蒋银华.政府角色型塑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从“统治行政”到“服务行政”[J].法学论坛,2016(34):19-25.
⑤ 刘炳君.当代中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论纲[J].法学论坛,2016(31):117-124.
⑥ 于泓源.关于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4):36.
⑦ 刘益良,朱赛金,高敏.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探索与思考[J].江南论坛,2013(7):36-37.

（3）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相关研究

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支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化发展，并关注到了信息技术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中的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多元化供给模式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如孙海涛提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要以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为要求，设计并推行高效的多元协作供给模式。[①]刘建认为应该以需求导向原则作为标准化建构原则之一来构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标准体系，以农民生活需求群体、需求程度为主要依据，并根据转型时期农民生活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清单的制订，以期形成适应农村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②]高海虹提出基层政府要提供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公共服务，要清晰认识到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作用，通过供给方向的改革发力向需求方向转变，通过社会和市场机制调整供给结构，实现资源配置，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供给模式，实现供需平衡。[③]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抓住互联网技术发展提供的新契机，探索和关注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供给模式。王贺洋提出，“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是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改革的有力引擎，有助于法律服务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使其更贴近基层群众生活。[④]王林认为，“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把普惠性、均等性的法律服务带到人民群众身边，保证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⑤]钱佳、姚晓炜认为，推进智慧公共法律服务发展是司法行政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既能为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也能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⑥]

2．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不同国家司法体制和发展历史不同，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这项工作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在国外研究中涉及较少，大多外国学者主要以“司法服务”、“法律援助”等作为研究方向。在西方国家，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以公共服务为发展基础，最初并不是以政府为主导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更趋向于作为慈

[①] 孙海涛.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8(5):18.
[②] 刘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41-42.
[③] 高海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J].理论探讨,2017(6):168-173.
[④] 王贺洋.“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J].人民论坛,2018(20):92-93.
[⑤] 王林.构建“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思考——以青海省为例[J].中国司法,2020(12):41.
[⑥] 钱佳,姚晓炜.智慧公共法律服务发展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为例[J].中国司法,2021(2):41.

善事业进行研究。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典自然法学派，以卢梭、洛克为代表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理论，构成了西方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规范了西方公共服务实践的发展方向。

（1）国外关于供给主体相关研究

在国外关于供给主体的相关研究中，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矛盾调和的需求，诸多学者认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应该从慈善活动转化为政府责任，政府应当成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主体。英国学者马歇尔提出了社会权利理论，他认为社会的公共法律服务不再只是一种慈善性质的行为，而是一项国家责任，应由国家来提供这项服务，公共法律服务应该是社会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①]Helmut Köhler 认为政府需要及时跟进整个社会的动态，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社会成员都应该维护社会利益，将其当成一种重要的责任，政府无论提供何种形式的公共服务，都需要关注公众的需求和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应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核心目标，由此才能实现政府最大的价值。[②]郑先红、徐前和凌谨认为公共法律服务最初是被当做一种慈善行为而进行研究的，后续提升到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研究，而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又被认可为一种社会福利，因此公共法律供给完成了从慈善活动到政府责任的转变。[③]

（2）国外关于供给内容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的研究涵盖面较广，包含了社会层面和政府机构等不同方向的法律服务，其中尤以法律援助为重要的供给内容。王舸提出，国外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包含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但不止于此，后续还发展了政府法律顾问、法律规范起草、司法考试、司法协助等为政府和司法机关提供的法律服务。[④]另外诸多外国学者还肯定了法律援助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的重要作用，且其方式方法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优化。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建立法律援助中心，为公民提供必需的法律援助服务。Earl Johnson 提出，

[①] Marshall T.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M].Pluto Press,2015:53-70.
[②] Helmut Köhler.BGB Allgemeiner Teil[M].Aufl München,2008:172-188.
[③] 郑先红,徐前,凌谨.英国司法制度概述及启示[J].中国司法,2011(12):87-95.
[④] 王舸.国外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职能简介[J].中国司法,2008(10):103-107.

法律援助计划相关政策必须在“所服务地区的居民和群体成员”的参与下制定，以保障民众在法律援助中获得公正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①]

（3）国外关于供给模式相关研究

在关于国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到了多样化的供给模式，且重视网络技术为供给模式带来的革新。国外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例如丹麦设有政府专职律师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德国和英国设有政府法律援助模式，美国设有法律服务供给混合模式等。国外学者对于供给模式的讨论带有经济学方向的思考，比如萨拉蒙提出应建立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的供给模式；[②]另外萨瓦斯还考虑了政府推动私营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包括委托、撤资和代替在内的三种路径。[③]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革新方面，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对法律援助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援助工作逐渐向技术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对拓宽法律援助渠道、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矛盾纠纷解决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Daniela Piana 认为法律服务与数字基础设施的结合可能成为更好的治理新通道，他提出要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技术应用于法律服务和司法机构时进行批判性思考，通过设计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符合人权的技术评估和人工智能监测与评估系统，更好地进行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供给。[④]

3．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合前述内容，可以发现国外有关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研究比国内起步早，研究内容相比之下会丰富一些。由于国情不同，国内外在涉及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差别。

在供给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均关注到政府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工作中的作用，不少学者都强调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国内外政治体

[①] Earl Johnson.Justice and Reform:Formative Years of the American Legal Service Programme[M].Taylor and Francis,2020:52-67.

[②] Salamon L M.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38-84.

[③] E S Savas.”Privatization” in Mary Hawkeaworth and Mau-rice Kogan,(Eds),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M].New York:Routledge,1992:67-119.

[④] Daniela Piana.Legal Services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s:A New Compass for Better Governance[M].Taylor and Francis,2020:56-92.

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差异，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政府并不是在一开始就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主体存在的，对于供给主体的探讨相较于国内会有市场化、经济化的倾向。而我国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有关政策，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始终以政府作为主要供给主体，因此国内在有关供给主体上的研究也较为统一地认为由政府主导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和管理，在研究中更倾向于政府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所体现的政府管理职能和社会治理功能。但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思考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他们普遍认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工作惠及民生，提倡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在供给内容方面，国外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研究更倾向于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去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研究方向主要以法律援助、政府法律顾问等为主，涉及的内容类别多、范围广，除了面向公民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以外，还有诸如司法协助、法律起草等向政府和司法机关等机构提供的法律服务。国内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对于供给内容研究的针对性不强，更多的倾向于包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内的涉及政府工作和民生实事的研究，研究的方向和思路靠近我国基层实际。可以看出国外相较于国内所研究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内容涵盖面更广，且服务的受众更加复杂多变，而国内对于供给内容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则是较为统一的。

在供给模式方面，国内外的研究都展现了一定的供给模式多元化倾向，都在寻求通过拓展不同的方式来提高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国外的供给模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出现了私营部门参与供给模式的情况，而我国的供给模式研究并不存在市场化倾向，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或政府作为主要管理部门而进行的。此外，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学者都先后开始探讨信息技术在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国外比国内更早地从信息化角度研究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

国内外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良好的参考意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课题有更深的认识和思考。根据前文梳理的有关内容和笔者所处地方实际，可以发现从基层政府公共管理角度、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基础、以群众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为导向寻求供给优化路径的探索仍然较少，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研究。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拟通过查找资料结合调查结果，以L区为例，对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合当地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具体工作情况，以及对当地的实地调查信息，梳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现状，并根据现状探究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相应的对策并尝试提出供给优化建议，以小见大，为优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提供路径参考。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面向L区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后搬迁至社会治理中心）申请法律服务的群众、L区本地线上网民等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对其进行有关L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工作的调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合理、科学、有效地分析。

（2）深度访谈法

前往L区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后搬迁至社会治理中心）等与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相关的主要单位进行走访，对服务部门进行现场实地调研，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当地群众开展访谈，了解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具体情况和有关工作实际成效，以期获得与本论题相关的一手资料。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1．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研究观点的创新。国内有关公共法律服务的研究大致集中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17111150110006134